

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社区教育丛书
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 尼西乡汤堆小学 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主 编 郭 净 和银华
副主编 章忠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小学乡土知识教育的实践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编.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 5
(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社区教育丛书)
ISBN 7 - 5416 - 2335 - 0

I. 迪... II. ①云... ②云... III. 藏族—少数民族教育: 乡土教育—教学研究—小学—迪庆藏族自治州
IV. G623. 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9202 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42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全套定价: 150.00 元 (共 4 册)

编委会名单

主 编：郭 净 和银华

副 主 编：章忠云

编 委：陈 峰 欧阳光 孙诺七林 此里卓玛 杨立新 苏雄娟

指导教师：张红军 王 美 罗晓红 汪春兰 马学东 李继英

社区专家：孙诺七林 恩 主

项目管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局

项目实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Bama Mountai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中心完小 汤堆小学

前 言

从2003年9月至2006年2月，我们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尼西乡的两所小学开展了社区教育的活动。该活动是云南省传统知识和生物多样性社区教育（Community - Based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Bio - Cultural Diversity through Strengthen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Yunnan）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三个组织共同承担，福特基金会北京办公室赞助。其目的是在云南省的藏族、哈尼族、纳西族的三个农村小学开设以传统知识为主题的实践活动课程，以寻找将社区教育与正规教育结合的途径。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在当地教育部门和社区群众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尼西乡的汤堆小学和中心完小初步开设了“综合实践课程”，由师生们定期进行四个主题的调查以及相关的多媒体教育活动。不管这样的实践将来能否持续下去，它都已经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改革贡献了一个可供讨论和思考的案例。在此，我们对参与该项目和支持我们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社区教育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参考资料很难寻找，我们在编辑本书时，特地汇集了与这个项目有关的文章和图片以及老师和学生的文章，还收入了很多原始资料，如校本课程编写的脚本、阶段报告等，为研究农村教育改革和其他开展社区教育的人们提供参考。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组

www.bamamount.org

bamamount@163.com

一、概 论

统一认识 创造条件 认真搞好校本课程开发

——在尼西乡汤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教学观摩现场会上的讲话

松海明

迪庆州教育局局长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集各县教育局领导，各县教研室主任和部分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到这里召开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教学观摩现场会。首先，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对尼西乡汤堆小学和中心完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情况的观摩学习，促进迪庆州农村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统一认识，克服困难，加强校际之间的交流和借鉴，认真思考如何开发适合自身实际的校本课程工作。

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1 迪庆州课程改革的基本情况

2002年秋季开始，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和州属中小学全部进入了新课程改革实验，各校从起始年级开始使用新课程标准教材，2003年秋季起，德钦县、维西县也全部进入了课改实验区。目前全州所有初中年级均为实验年级，香格里拉县小学一至四年级，德钦、维西小学一至三年级全部进入课改年级。课改实验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指导下，正在顺利进行，并向纵深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各小学实验年级反馈的情况看，教师和学生对课改实验是非常欢迎的，也基本达到课改的要求，初中各课改年级的教学状况也非常满意。2005年迪庆州首批进入课改实验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全省课改区中考，总体情况令人满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小学校长和教师对本次课程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对新课程的理念不够明确，在教学中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二是有部分农村小学没有按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开设应有的学科，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应该看到本次新课改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就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是一种与各种学科有着本质区别的课程领域，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教育、社区服务与社区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四大领域。我们为什么把今天的现场会选在尼西来开，是因为尼西乡汤堆小学充分利用学校周边的课程资源，在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和大

力协助下，开发出适合本校实际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编制了《综合实践活动指南》，并付诸于实际教学中，同时尼西中心完小在信息技术和民族健身操方面也有鲜明的校本实际，这些都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典型。

2 努力开展好综合实践活动，加大校本课程的开发力度

综合实践活动课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根据国家课程设置方案的要求，该课程从小学三年级开设至高中三年级。针对迪庆州广大农村小学对这门新学科的开展还有较大困难，特别是针对这门学科的认识不到位的状况，州教研室与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在尼西乡中心完小、汤堆小学全体师生的配合协作下，合作开发以综合实践活动形式的校本课程，形成了《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南》的物化成果，为在迪庆州农村小学广泛开展这项活动开了一个先例，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们通过这次现场会的观摩学习，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引导广大农村小学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学校周边的课程资源开发校本课程，开展适合自己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同时希望大家通过观摩学习，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思考校本课程开发工作，逐步提高迪庆州农村小学的综合素质，为将来的进一步学习和成长打牢基础。

3 进一步加强农村小学教育管理

迪庆州 80% 以上的小学均在农村，加强农村小学的管理，提高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迪庆州已全面进入“普九”攻坚阶段，前不久香格里拉县的“普九”已基本通过省级验收，这对迪庆州来说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善事。我们教育系统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认真抓好普及、巩固与提高工作。为此，我们还要特别要求各县认真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校长要充分认识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加大教师培训力度，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课改服务；二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检查和了解各级小学常规管理的执行情况，要下功夫抓好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三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检查和监督各级小学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计划的情况，严格要求各级各类小学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四是各县各学校要紧紧抓住这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高教育水平。教育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各学校要根据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切实抓好校本发展，为全面提高迪庆州教育水平作贡献。

同志们，春华秋实，秋天是收获果实的季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的工作中勤奋求实、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努力提高农村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谢谢大家！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章忠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位于云南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的迪庆是云南省惟一的藏族自治州，下辖香格里拉（中甸）、德钦、维西三个县，有29个乡镇，总人口333919人（2002年统计数据），184个村（居）民委员会，千人以上的世居民族有藏、傈僳、汉、纳西、白、彝、回、普米、苗等9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3.56%，其中藏族人口有近11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各民族居住的环境不同，传统教育的差异性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平衡，迪庆的教育事业存在着不同的、多层次发展的状况，面对当今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只有认真研究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民族教育的特点，从迪庆的实际出发，才能加快迪庆的民族教育发展，使民族教育既适应社会需求，又适应当地发展的需求。

1 20世纪50年代以前迪庆的教育状况

回顾云南藏区的教育发展史，20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社会发展程度低，教育发展缓慢，除中甸县城、德钦县城、维西县城、中甸江边境等地的居民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外，其余广大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懂汉语、汉文的为数很少。根据民国年间的《中甸县志》、《云南德钦调查报告》、《维西县志》有关民族人口的记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香格里拉全县共有28578人，其中藏族有9770人，汉族1218人，其余为纳西、傈僳、彝、回等民族；民国二十九（1940年）年德钦县共有1236户，5266人，藏族占绝大多数；维西县在民国二十一年有9107户，42625人，其中藏族有7千余人，汉族4千人，纳西族6千人，白族约1千人，普米族约1千人，怒族1千余人，独龙族1百余人，彝族50余人，其余都是傈僳族。

从这些数据可知，今天的迪庆州当时是个以藏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共同居住着的地方，因此各少数民族的母语应该是当时的日常交际用语。文字方面，迪庆地区纳西族的东巴文仅在东巴中代代相传；彝族虽有文字但掌握彝文的人极少；傈僳族的老

傣僳文^①只在基督教徒中使用，傣僳族的音节文字^②只在维西的少数傣僳族中使用。藏族则在藏传佛教传入时便有了以寺院为主的藏文教育，因此正如《中甸县志》中所记载的，迪庆人民“咸习藏经、不识汉字，惟进城者渐能通晓。”；“家以藏经为富，皆古宗字，来自西藏”；这里需“语言通事”，而且“凡汉人与其往来文件，恒常使用应翻译之。”藏文的广为使用在藏文历史档案中也有体现，《中甸藏文历史档案》中共收集了66件档案，除《和平谈判协议》一件有藏汉两文版外，其余原件均为藏文，这些藏文历史档案涉及各个方面的内容，有的是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布达拉宫等颁给中甸土司、僧俗的公文、旨谕、执照；有的是蒙古和硕特部颁给当地官民的公文、执照；有的是驻地部队首长、鹤庆军民府、提督发给土司的执照；有的是本寨公约、土地出卖契约等等，这66份藏文档案年代最早的为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晚的到1957年，这些档案充分反映出藏文是迪庆藏区的通用文字。

从明末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蒙古和硕特部南下占领迪庆到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之间的70多年里，迪庆的政治、宗教、社会发展几乎都与西藏连成一体。西藏格鲁派在迪庆的势力得到大大加强，迪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之密切相关。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走向都是围绕着神秘的佛教世界，一切文化艺术都是为佛教服务的。在教育上也不例外，形成了寺院和私塾为主要形式的着重学习佛教知识的藏文化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迪庆归滇后，使迪庆的政治、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自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通判陈权在迪庆的维西永安村设义学管起，开始了迪庆的汉文学校教育；鸦片战争后，国外教会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传教士大量涌入我国。他们不仅在内地传教，甚至进入了藏区边地，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将中国藏区划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区。清咸丰三十一年（公元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主教传教士进入西藏的要求，遭到藏族僧俗的抵制和清政府的限制后，传教士们沿澜沧江、怒江南下，进入迪庆的德钦、维西和怒江的贡山藏族聚居区，建立了西藏教区云南铎区，并开设教会学校，用以传播圣经知识。

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藏区的教育有三种形式：以传授藏文化为主的藏语文教育、起步较晚的传授汉文化为主的汉语文教育和传授《圣经》为主的西方宗教文化教育，但几种形式的教育面都不是太广。

1.1 藏文化教育

就藏文化教育来看，除了少数土司、头人所办的私塾外，当时分布于迪庆各地的寺院是学习藏文化的学校，而没有其他专门的社会教育学校。因此寺院成为具有综合性职

^① 老傣僳文大约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前后，由在中缅边境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有40个字母（声母30个，韵母10），六个声调符号，两个标点符号。这种拼音文字主要用来译写《圣经》、《赞美诗》等基督教经典，随着基督教在维西傣僳族中的传播，便在傣僳族基督教徒中流行。

^② 由维西叶枝傣僳族哇仁波于1923年始，历经10年左右的时间创造的文字，有918个字符组成，当时学习和掌握该种文字的人有300余人，主要流行于叶枝、白济汛一带。

能的场所，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政治活动的中心，又是学习藏文的学校。由于迪庆境内的大多数藏族信仰藏传佛教，有“家有三子，必送二子入寺为僧；既有子女各一之家，亦有将其子送寺为僧者”^①的习俗。

由于藏族的寺院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非常完备的教育制度。据史料载，在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创造了文字、历法、翻译出了大批佛教经典，为教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统治阶级出于弘扬佛法的需要，教育一开始便被用于佛学教育，佛学教育代替了社会学校教育。到14世纪，藏区各地的佛教寺院培养造就了大批佛教经典译师，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的同时，也涌现出像《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布敦佛教史》、《贤者喜宴》、《智者喜宴》、《红史》、《青史》、《甘珠尔》、《丹珠尔》等大批藏族僧侣的佛学著述，为藏族佛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佛学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从内容到形式都自成体系的制度和办法。在形式上分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拉萨的三大寺是全藏区的高等教育中心，各地数以千计的中小寺院则是中、初等教育中心。迪庆的大小寺院也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个教育体系里的一分子。

在迪庆以松赞林、东竹林、德钦林等20多个寺院庙宇为中心的中、初等佛学教育中心，当出家的僧人一般到了八九岁时，便要受沙弥戒剃度，受了沙弥戒剃度之后才是一名正式僧人“奔扎”。成为“奔扎”之后，要在所出家的寺中学习、做事10年。在这10年中，除了做好寺中的杂务外，主要在寺里拜一名学问好的僧人为老师学习佛学知识。这是一种师徒之间的单独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学习文字，即学习藏文的文化课；二是学习经常用到的佛教经书，背诵宗教活动常用的经文；三是学习各种戒律和寺院的规章制度；四是学习各种实用技能，如做酥油花、各种供品、学跳神、学习法器的使用等等。经过10年的学习和劳动，每个僧人都必须到拉萨的宗主寺受比丘戒，取得“格弄”的职位。取得格弄职位后，经济状况不允许的僧人回到各自的寺院做一名普通的僧人，而条件好自己又愿意深造的僧人，则可以提出申请留在三大寺中作一名学经僧人。

进入三大寺学经的僧人，最先被编入预备班学习。在预备班学习的僧人被称为“呗恰娃”，意思就是读书人。他们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根据经师的推荐，可以转入正式班学习显教五部大论^②。正式班分有年级，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分15级，色拉寺和噶丹寺则分13级。每一级分期一年到两年进行学习，最高一级叫“增堂波”。僧人在正式班学习期间，除了在开坛时听大喇嘛传经之外，大都以自学为主。不论僧人是否完成应修经典，寺院按年限升级的办法让每位满年限的僧人升级。但在最高级别“增堂波”学习的僧人，却是没有年限的班级，许多僧人只能学到这里，只有少数学业优

^① 黄举安《云南德钦治局调查报告》（民国37年），见《德钦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五部大论包括《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具舍论》。

良、家庭经济富裕的僧人，才能经过经师推荐向三大寺的扎仓^①申请报考最高学位“格西”。取得“格西”学位的僧人，说明在显教方面的学习已达到一定程度，往后可出席寺内部分重大会议，收授门徒，外出传经，同时也有资格升入三大寺学习密宗。

进入三大寺学习密宗的僧人，在修习数年后，有的被派往各黄教寺院担任主持等重要职务，有的则留在三大寺从事佛经、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的研究和担任某些重要职务。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进入三大寺学习的僧人，要想获得“格西”学位，除了自己要刻苦攻读外，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后盾。在三大寺学习最少也要20年以上，每年的生活费、拜师求学的费用、通过答辩考取学位时应送的各种礼品的费用十分巨大，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僧人则无力承担完成学业的费用。

在藏文化教育中的私塾教育，对迪庆地区学习和使用藏文的影响也是较大的。据史料记载，到清末民初时期，中甸、德钦教授藏文的私塾已普遍存在，许多私塾由当地土司头人单独请老师在家教授；也有的私塾是入学学生各家出资聘请老师合办的；还有收徒做工并教书授文的。教授的内容除了开始时的藏语文基础知识外，大都是学习佛教经书，当然也学一些生活应用文，诸如记账、写信之类的写作和练习。

1.2 汉文化教育

就汉文学校教育而言，在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通判陈权在迪庆的维西永安村设义学馆起，开始了迪庆的汉文学校教育，随着维西永安义学的开设，中甸、德钦也相继开设了义学馆，同时在各县城和有的村社由官宦人家或家庭富裕的人家聘请塾师开设私塾。由于义学几乎都设在县城或大的村镇，学馆数量不多，迪庆境内少数民族众多，能够上学读书的人有限，尤其是离城镇较远的村寨，义学难于得到巩固。嘉庆、道光年间有的土司家中开始设馆聘请塾师传授汉文。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迪庆境内设立学额，在此之前迪庆地区一直未设学额，文、武生员都附属丽江府学参加科举考试。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奉文兴办新学，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义学多数改为学堂，兼习中西之学，开始了近代学校教育。随后，在一批抱着教育救国思想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云南地方当局开始重视边疆地区的民族教育，成立了“永顺普镇沿边学务局”，专管边疆民族的教育事物，拨出专款作为发展教育的费用，在迪庆地区也创办了“土民学校”，即“简易识字学塾”。到清朝末年，汉文水平较高的人开始增多，有的村镇出现了村镇学馆，同时私塾也较前增多。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民国政府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增办初级小学，规定6~12岁的儿童一律编入初小读书。民国二十九年义务教育被废止，民国三十年改办国民学校。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以前，迪庆地区小学的教育制度同内地一样。在官府设置的为数不多的义学和少数当地人自办的私塾中，学生都不多，五六人到二三十人

^① “扎仓”原指僧院，是僧众学习经典，研习教义的地方。后来演变为寺院组织机构的名称，是全寺性的组织、管理各寺属部门（康参），所属地区全部僧人的机构，内部包括最高的宗教组织机构和最高行政组织机构。

不等，教师几乎都是从社会上聘请来的秀才、举人。在义学和私塾中不分班级，儿童入学后，最初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字鉴》以及明代云南人兰茂编的《声律发蒙》等基础知识；随后便要学习《幼学琼林》、《考经》；进而学习，《四书》、《五经》、《左传》、《纲鉴》等书籍。学习除了读书外，还要习字、对对、作文。习字主要是通过描“描红”的方法练毛笔字和记生字。对对先学两字对，逐渐加至七字，为作律诗打基础。作文以制艺为主，学习作八股文章。这种教学的目的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所开办的新式学堂中，按照官府颁布的《钦定蒙养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的规定，蒙养小学实行4年的修业期限，初等小学为5年，高等小学为4年。这一时期初等小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讲经读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8门课程。高等小学加了一门图画课。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初等小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修身、算术、体操、唱歌、图画等课程。从内容上看修身主要是学习《近思录》、《人谱》、《蒙养图说》等书籍，读经讲经以《左绣》、《古诗源》、《礼记》、《四书》、《诗经》等为教科书，历史以《纲鉴》、《史鉴节要》等为教科书，算术以《简明算术》为教科书。尽管本着新式办学的思想，在办学制度上更多地吸收了日本与西方国家办学的内容，在形式上有了许多改变，但是教科书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把修身、读经讲经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把灌输儒家思想作为培养人才的第一要务，这与原来的义学没有多大区别。

辛亥革命之初，临时政府对晚清的小学教育进行了多方面改革，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与美感教育。颁布了《小学校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废除读经。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起，迪庆地区实行“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学习期限为4年，高等小学为3年。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改为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2年的学制。30年代以后，民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苗民教育”，在民族地区建立省小及分校，以招收“土民”儿童为主，在迪庆三县县城相继建立了三所省立小学。课程有修身（后改为公民）、国文、算术、社会（包括历史、地理、卫生）、手工、图画、音乐、自然、体操、战时常识等，女生加缝纫课，男生加农业课。除了音、体、美、劳四门课的教授内容由教师自行选择外，其余课程都使用商务出版社的标准小学课本。这些课程的设置，是按照校令和教则的宗旨“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所制定的，比如国文课的要旨是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算术要掌握运算方法，中国历史要讲近百年来中外关系史，目的在于“养成国民之志操”。因此这一时期的小学教育，主要以强调适合儿童身心发展，启发兴趣的教育。在教学上强调实物直观教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从这一时期教育的宗旨和形式看，它奠定了我国小学教育的格局。

尽管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教育中做了不少事，但其推广面并不大。比如，在迪庆的中甸，到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共有普通小学30所，37个班，1265人。其中除了省立小学和县立一二级小学设立在县城外，其余28所学校都

设立在汉族、纳西族聚居的江边境内。为了推行义务教育，政府在藏族聚居区大中甸、小中甸、格咱、东旺、尼西等地摊派学生名额勒令入学，终因藏族儿童宁愿进寺院出家当喇嘛也不愿进学校学汉文，甚至有的土司、头人家庭出钱雇请农民子女或家奴充任子女入学，加之学校条件简陋，经费不足，义务教育难以维持。到1950年迪庆地区和平解放时，共有公立、私立小学140多所，初级中学1所，认识汉字的人不足5%。

1.3 教会教育

自清同治元年三年（公元1862年~1864年），天主教在德钦县燕门乡茨菇村建立起云南藏区境内第一座天主教堂始，至1950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时，先后在迪庆建立了9座教堂，开办教会小学6所，教堂修女院两所。教堂小学的课程设置是为了服务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因此据现在健在的茨中村天主教老教友，曾在修女院学习过的82岁的玛利老人讲：在教堂小学主要学习的是《圣经》、圣义，每年春天和秋天约学习半年左右，教徒子女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男生有两个专职的教士授课，女生由修女授课，教材是译成藏文的《圣经》，三年以后，学习优秀的有望送往维西花洛坝教堂的小修院深造，学习汉文及拉丁文。教会教育的启蒙课是从藏文基础教育开始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藏文基础是无法阅读和学习《圣经》的。因此教会教育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传授了藏文字。

2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迪庆的小学教育状况

1950年以后，随着迪庆三县相继和平解放，云南藏区的教育逐步走上了国民教育道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

1950年，省军管会成立了文教接管部，接管了民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省立小学、教会学校、民族中学及其县以下办的各种中小小学，同时对部分私立小学进行了改造。迪庆地区各县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教科主管教育工作，在“恢复原校，暂维现状，逐步改进和提高”方针的指导下，慎重稳妥地把旧教育向社会主义的民族教育进行改造。据统计到1952年，中甸学校发展到70所，在校生3208人；维西的学校发展到101所，在校生4204人；德钦学校发展到17所，其中5所为藏文学校，在校生1171人。在整顿旧学校的同时，人民政府针对迪庆地区经济文化薄弱，文盲众多的现状，从内地大量调进支边人员组成教师队伍，建立起从幼儿到成人的多种教育形式。支边教师积极学习当地藏语，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主动上门动员学生入学，用民族语言教学，逐步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特别是各种扫盲夜校、短训班、农技班的设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云南藏区，培养了大批有一定文化的藏族人员来充实国家机关，管理自己，不仅促进了新旧社会的平稳过渡，也使民族教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云南藏区的教育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着，教育不是

以教书育人为中心，而是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师生停课闹革命、大批“边疆特殊论”，民族教育与内地汉族一样搞一刀切，“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盲目发展普通中小学，不顾客观条件，凡自然村、生产队都设立小学，到1971年，仅中甸县小学就发展到312所，在校生9725人，26所完小附设初中班56个，3所小学附设高中班，造成教学严重脱离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教学讲量不讲质，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制，创办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校，办学形式单一，取消民族语文教学，严重影响了迪庆地区教育的正常发展。贻误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许多多年从事民族教育的干部、教师，惨遭打击、迫害，有的老师仅上过小学二年级，后来经过短期培训，就承担起一个学校的教学任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现象是比较多的，云南藏区的民族教育遭到严重摧残。

1980年以后，云南藏区的教育逐步走上了正轨，迪庆的教育部门按照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对迪庆的教育工作进行了整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迪庆的教育事业。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采用大量调进、分配、自己培养等措施，使云南藏区的民族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如今云南藏区的教育已初步形成从幼儿教育到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教学体系。就云南藏族聚居地迪庆州而言，在“九五”期间，全州继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快了“普六”步伐，使州内六年制义务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1999年，有小学924所，在校生4126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96.3%，教职工2660人，其中专职教师2518人，学历达标的2166人，占86.1%。开设藏语文课的小学有27所，学生709人。民族学生占在校学生比例的百分之87.9%。同时，1999年底，全州21个乡镇进行了县级“普六”自查评估，州级复核验收，已“普六”的乡镇占需“普六”乡镇总数的百分之75%。1999年，全州有中学26所，其中完全中学6所，初级中学20所，在校生9324人，其中高中生1402人，初中入学率达51.34%，教职工1226人，其中高、初中专任教师分别为130人、690人，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是80%、73%^①。到2005年全州完成“普六”工作，开始全面开展“普九”工作。

1950年以来的40多年中，云南藏区在学制、教学内容方面也因时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950年各小学仍然沿用“四二”分段制，到1959年，有的小学实行5年一贯制，到1966年农村完全小学逐步改行5年制，有的村小还实行4年制（半日制耕读小学），“文革”期间，学制处于混乱的局面，但基本还是5年制。1980年以后，小学逐步改为6年制教学。1993年，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六三”学制，小学为6年，初中为3年。

在教学内容上，1952年按照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教学计划，低年级开设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工，高年级增设自然、历史、地理。1956年执行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初小每周的课时开满4节，高小每周的课时开满26节，同时完善了语文课的内容，使其包扩阅读、作文、写字的内容，还增设了手工劳动课或

^① 以上数据见迪庆州教育局1999年工作总结报告。

生产劳动课，高小加设农业常识。“文革”时期，小学1~3年级开设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体；4~5年级增设政治、常识。这一时期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大都使用云南省编乡土教材和毛主席语录。1978年，各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小学教育开始实施教育部提出的“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计划”，开设的课程有语文、数学、政治、自然常识、体育、音乐、美术等国家统编教材或云南省编教材。1982年始，开始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六年制教材，开设语文、数学、自然、地理、说话、写字、思想品德、法律常识、唱歌、美术、体育等课程，有的课程因年级高低不同有所变化。到1993年，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县城小学和部分乡村小学大都使用全国统编教材，部分乡村小学使用云南省编教材。

从云南迪庆藏区的教育发展情况和上面的数据中，能够看到这里的教育经历了从以寺院为中心的藏文化教育到藏文化与汉文化教育同时存在，再到汉文化教育逐渐被少数藏族人所接纳，继而以汉语文为主要载体的国家教育成为整个民族教育的主要形式，再发展为与国家教育形式相一致并逐步恢复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形式；在教师的来源上，50年代以后，首先依靠从内地派来的部分教师，同时在当地培训藏族以及派到内地学习两种形式解决师资问题，80年代以后，开始有大批藏族大中专专业毕业生从事教师工作。云南藏族教育上的变迁状况，既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又体现着云南藏族看待汉文化的心理——从50年代以前的抵制到完全接受的包容心理。

3 迪庆基础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迪庆州的基础教育目前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无论在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都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这里主要谈谈基础教育教学和教改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3.1 点多面广，教学分散

迪庆州的小学教育中有924所学校和校点，其中587个是一师一校的校点。有两个老师以上的学校很少。因此在迪庆州小学教育是一种比较分散、以一师一校为主的教育。

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按过去的三师标准——初中毕业生为合格，随着教育的发展和要求，小学教师中40%以上要达到专科水平。按目前的三师标准，全州小学教师合格率为95%。

这些数据说明，目前迪庆州的教育中，基础教育的基础显得相当薄弱，主要的困难和所反映出的问题是点多面广，小学相对分散，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集中在一师一校的范围内，因此对于小学教育的任务是研究及关注一师一校和两师一校的教学点。

3.2 校本课程亟待开发

目前迪庆州的课程管理是实行三级课程，一个是国家课程，采用的是人教版的课本，目前还新增了科学课程，代替了过去的自然学科，范围上有所扩大，这门课从小学

三年级开始学；二是地方课程，迪庆州曾经编了一套“迪庆地理”，通过了省教材委员会的审定，是作为州里的地方课程教材使用的，在地方教材这方面也使用省里的其他一些地方课程来教学；三是校本课程，目前第七次课程改革的重大内容就是增设校本课程，给学校更大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但目前迪庆州的校本课程建设方面还处在起始和实验阶段，还没有什么好的成果或经验可以采纳。

就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而言，目前的困难和问题都没有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大。说到校本课程，许多老师或个人都认为要有教材，编写体系要与国家的体系一样。如果这样做对学生而言，是否违背了设置校本课程的初衷和学生学习的特点。设置校本课程的目的，一方面是课程的内容要反映当地的文化生活，适应当地学生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要达到锻炼学生学习和提高实践的能力。如果依然按照应试教育的方法操作，那么设置校本课程只是增加了学生、老师的负担，对提高学生能力方面有多大意义呢？因此，在教学改革中，迪庆州的校本课程改革面临着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估等许多新的尝试和实践。

3.3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点有待突破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民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这个观点是众所周知和得到认可的。但是，教育的方式、方法、内容得不得当，结果却是不同的。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迪庆州的教育自50年代以来，一直走的是与内地教育基本相同的道路。从全州来看，我们的民族教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学校数量不断增加，受教育的人逐年增多，发展了一批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为迪庆州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众多人才。但是，对迪庆州924所小学中的587个一师一校的校点而言，这些校点的大多数学生初中毕业后，他们有许多都无法或没有经济能力进入更高一级的学习。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生计问题，何况有许多学生其实在小学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了（2005年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他们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与内地或者当地城里的学生相比，相差很大。首先他们要突破语言障碍，乡村藏族孩子几乎只会藏语，汉语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尽管老师尽量用藏语进行辅助教学，但对于七八岁的孩子而言，身边的家人都不会讲汉语，没有什么语言环境，因此他们几乎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适应从母语到第二语言的转变；其二，由于课本的内容与身边的事物相差太远，对于处于形象思维中的儿童来说，难于理解；其三，由于学生在校学习，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传统知识，他们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回到农村，难于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家长对读书的好处持怀疑态度。

汤堆小学是我们进行社区教育的一个实验点，从办学规模、办学设施等看，在迪庆州属于中等偏上的小学规模，同时也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100%的学生都是藏族学生，在语言环境、教学难度、认识观念等问题上都代表全州的共性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村民的发言令人深思，他说：“让孩子读书是件好事，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我们这个地方读书，不可能像有的地方那样靠它吃饭，什么事都是要靠自己的双手。靠我们的土地，不现实，因为高原气候冷，再怎么辛苦一年也不可能收几季，因此

最起码我们要懂得适合自己地方生存的知识。像我已经 50 多岁了，当年我们村里一起读书的有 10 多个，大多数人现在依然在农村靠种田、靠手艺生活，现在我们全村 1500 多人中，80% 的娃娃读书后都是回到村里干活。因此学校除了教学生学习课本的知识外，教一点身边的知识，将来对孩子来说更有好处。”

从这方面看，这里并不是否认现代教育的积极作用，只是觉得在内容和方法上如果有所整合，那么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现实矛盾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国家提出的第七次课改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总之，迪庆州的民族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大多数人依靠老人们的言传身教和共同参与社会生活，学会了身边的传统知识和接受了社会道德等的教育；有部分人则通过寺院学习了藏语文及宗教经典。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迪庆地区的教育走上了国家教育的道路，教育逐步发展起来。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迪庆的教育事业与全国一样遭到了极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得以恢复，迪庆地区的教育事业走上了比较健康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到 2005 年，迪庆州全州有 924 所（个）小学及教学点，其中 587 个是一师一校的教学点，小学在校生有 36668 人，小学专职教师有 2448 人，小学教师达标率在 96.36%（标准是中专以上学历）；有中学 25 所，在校生有 18916 人（其中高中生有 3850 人），中学教师有 1001 人，初中教师达标率在 92.62%，高中教师达标率 85.58%；在全州三县中香格里拉县于 2005 年实现“普九”教育的省级验收，维西县预计在 2006 年实现“普九”的省级验收，德钦县预计在 2007 年完成。